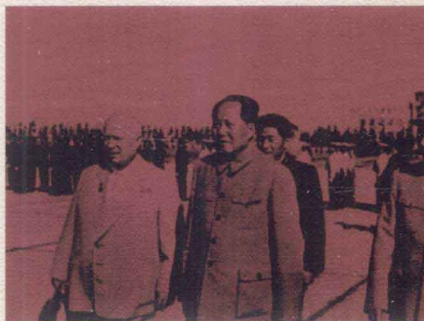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史论

实证的知识呈现与思想表达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PRESENTING POSITIVE
KNOWLEDGE AND THOUGHTS

刘建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代中国史论

实证的知识呈现与思想表达

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PRESENTING POSITIVE
KNOWLEDGE AND THOUGHTS

刘建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史论：实证的知识呈现与思想表达/刘建平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097-2518-4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1399 号

当代中国史论：实证的知识呈现与思想表达

著 者 / 刘建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 薇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李 娇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7.75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 512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518-4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革命：思想的传播与权力的越境

革命政治过程中理论的生成：“新民主主义”溯源与辨流	3
苏联、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及其体制的确立	35
毛泽东的美国观与新中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形成	57
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新中国对日外交思想探源	84

第二部 建国：信念与谋略的政治、外交射程

新中国 1951：农业合作化决策的过程及其政治学意义	109
意识形态陷阱：国家工业化战略与农业合作化高潮	145
作为政治改革思想先驱者的刘少奇	194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217
“一边倒”冷战体制下和平共处的限度：朝鲜战争后中国 外交政策的调整	236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	253
中国国际战略的概念和历史阶段	286

第三部 反思：中国问题的知识确认

五四精神与中华民族新世纪的命运	301
-----------------------	-----

在比较历史研究中理解民族主义：伪问题与真问题..... 308

历史与政治学视野中的党史文献编纂..... 317

当代中国口述史的发展及其文化身份..... 332

社会史学视野中的公共安全问题..... 342

社会冷战论：在政治史、社会史研究中理解中国..... 351

化解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紧张：国际法准则和中国历史的逻辑..... 363

战争责任问题与革命外交遗产..... 374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383

战争记忆重构：后殖民文化的国际传播学分析..... 393

“西藏问题”视野中的西方与中国 404

边缘性焦虑：“不高兴”中国的病理分析 412

从世界历史和中国问题理解全球化：知识、话语、体制的
 主体性思考..... 421

从思想共同体重建共同体精神..... 428

后记..... 438

第一部

革命：思想的传播与权力的越境

革命政治过程中理论的生成：“新民主主义”溯源与辨流

在学术史意义上检讨现代思想研究，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得：“文革”时代的政治实用主义理论框架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在毛泽东思想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不断”或“继续”革命成为历史叙事的元话语；而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则发生了向发展主义、经济中心主义的转换，思想理论总要被论者拿来在“符合实际与否”的尺度上检验一番之后再作价值判断。前者可以说是政治史取向的革命思想史范式，后者则是社会史倾向的现代化思想史范式。大致而言，政治大气候压力下的革命思想史研究总能定一说之尊，因为以“主义”为“科学”的真理优先权得到了话语界面背后的“专政”权力支撑；但经济中心主义和以“实践”为“标准”的时代语境中对“符合实际与否”的论证则发生了截然对立式分裂。尤其在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相关连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研究方面，如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也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从而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践推到了一个新阶段；^①有人则指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根本上忽视了”消灭私有制所必需的“经济物质基础”，把消灭私有制的任务提前到“近代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充分发育”的阶段来实行，“是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是“机械地或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学说”、“照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把从中国实际出发而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灵活政策贯彻到底，轻率地把富有中国特色的好的路线政策给丢掉了”。^②比之于“新民主主义发展论”的革命思想史赞歌，“新民主主义放弃论”的批评固然是努力脱离

① 范守信：《走历史必由之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第174页。

② 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281、299、301页。

政治空论的严肃历史检讨，但必须注意到：判断“符合实际与否”需要工作量巨大的数据调查、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与比较，该项工程之繁难，至少是目前的学术队伍不胜负担、资料条件亦不具备的；也就是说，所谓“符合实际与否”之类的“公婆说”在学术意义上并无充分的实证分析作可靠支撑。而且，“新民主主义放弃论”研究的目标模式和学术方向感，与革命思想史研究并无不同，都是要论证某一种绝对真理，即也努力定一说之尊。

但我们知道，从哲学意义而言，并不存在超然于人类理论语言表述之外的所谓“实际”，也不存在与某种理论预设相对应切合而发生的人类历史——历史是在各种主体间对话和政治力量斗争中取舍可能性而展开的。把建国前后不同政治过程中生成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缝合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论”是“一贯正确”的论法，完全忽视以“不断革命”为根据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新民主主义“长期性”的否定；而表示“历史遗憾”的“新民主主义放弃论”是对没有做到“一贯正确”之空想的遗憾，它看到了建国前后政治、理论现象的骤变但欠缺系统的过程研究，尤其没有深入探讨新民主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因以及生成过程中所附着的策略性、暧昧性、矛盾性，也就不能够揭示新民主主义被社会主义革命论者“放弃”或者难以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论者所坚持的深层原因。总之，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研究虽然发生了长期的纠葛，但至今没有得出具有完整解释能力的结论。因此，有必要把不断出现的新的史料纳入学术视野，在实证的、充分接近历史的方向上探索新的方法和范式，这样才能比较有效地阐释历史并为思考现实问题提供经得起辩论的理论线索和思想资源。对于这种工作，1990年代以来出版的历史文献集大大补强了基本资料的系统性。本文把握新民主主义这一中国革命学说的发展线索，在革命的政治过程中探讨中国共产党理论的生成；既是对新民主主义思想源流的梳理，也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研究创造必要的知识前提。相信这种思想史的过程研究，比从文本到文本作复述性阐释更能够接近思想的原生状况，更能准确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文化机制；也会使人们无论在逻辑、理论抑或在经验、知识的层面上，更有兴趣认真地尝试对历史的思考与理解。

一、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体制下探索中国 革命理论：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中的 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政策思想

近代革命，特别是由西方思想提供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中国革命，已

不再是传统王朝循环历史观支配下的天命话语和道德政治的重建，而是要实行现代化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社会整体性改革，革命党的社会改造理论是革命以及革命后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作为革命的成功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国理论是“新民主主义”；作为一般的定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完满典型”。^①但这种说法不能解释“完满”的理论为什么在建国后被毛泽东“放弃”，更不能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建国后突然失去了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继续“完满”结合下去的能力。而在事实的方面，毛泽东1940年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立论框架是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949年初对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使者米高扬也承认：自己分析问题所“根据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前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示非常重要，自己“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并且奉行亲苏的方针”。^②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般论必须具体化，即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并非革命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抽象觉悟过程，而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指导为主要载体的；因此，研究中国革命理论，研究新民主主义，必须追溯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过程和中共在接受指导的同时积累革命经验教训的思想过程。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认识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破灭之后，开始根据其新的“东方路线”派出代表帮助中国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建党。自然的，中共的早期纲领和活动反映了共产国际代表对欧洲革命经验与理论的照搬，并不能提出适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农业国家的政策。共产国际代表强调中共的成立使“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朋友”的世界性“重大意义”，^③而中共“一大”的纲领也规定的是革命军队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以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在政治斗争中“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等等。^④随着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政治现实情况的了解和苏俄与中国北京政府建立正式关系方面的努力受到挫折，为了保证在苏联远东

① 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57页。

② 〔俄〕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72页。

③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26页。

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5、9页。

的利益，苏俄确定了援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力量推翻中国北京政府、建立反帝反封建并发展成社会主义的、与苏俄结盟的国家这样一个对华政策基本方针；共产国际代表则指导中共在理论上明确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步革命战略，在现实政治中采取加入被认为是处于苏俄思想影响之下、会变成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国民党之国共合作政策。因此，从在寻求最广大的革命力量意义上开展农民运动，到为动员农民、使农民“革命化”而强制重新配置生存资源——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所谓农民问题被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日程。在贯彻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决议和国共合作政策的中共“三大”（1923年6月）上，农民问题开始得到讨论，建党以来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被通过，内称：各地农村抗租抗税证明了受压迫农民的反抗精神，因此我党“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① 一直组织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也发言肯定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但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也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② 不过，中共“三大”只是提出了革命必须利用农民的被压迫处境来动员农民成为反抗力量的策略，其农民运动的指导思想回避了土地革命问题。这与苏俄、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中的矛盾有关。共产国际“四大”的《东方问题提纲》本来强调农民力量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并指明了东方落后民族在苏维埃制度下以小生产的合作社“过渡”到“共产主义文明”的道路；但作为对这一提纲的补充而给中共的指示，则要求利用资产阶级、军阀集团的相互角逐，“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要求中共“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要提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实行同唯一不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大国——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独立自主政策而斗争”。^③ 而且，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强调中共必须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训令，不仅忽视农民，也反对“夸大工人阶级力量”，即要求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寄身于国民党。这样，由于利己主义的地缘政治策略和实际利益追求，苏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18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第294页。

③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161～163页。

俄把实现其中苏结盟之地缘政治利益的欲望寄托于对中国国民党一相情愿的期待，所以苏俄的对华政策、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自始就存在着苏俄利益目标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矛盾；反映在对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思考和中共革命活动的早期，就是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在认识到农民运动重要性以后仍然期望着上层精英统一战线而忽视进行底层动员的土地革命。

当然，在革命政策思想史的意义上，共产国际明确要求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始于1923年5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此前，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和指导，共产国际执委会成立了以布哈林为领导的专门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①；发给中共“三大”的指示便是布哈林提出的修正案。该指示说：“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而回避这一基本点，都意味着不理解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顺利地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该指示还提出“力求实现工农联盟”的政治目标和建立农民自治机构没收地主土地并无偿分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以及“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原则。^②但这一指示由于路途耽搁，在中共“三大”召开一个月后才被收悉，对大会没有起到指导作用。不过，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时间的延误，因为1922年底1923年初远东共和国并入苏俄而苏联成立之后，意欲落实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斯大林、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给派到中国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苏联驻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的指示是“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③也就是说，苏联为其自身的利益，希望通过支持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反对在中国瓜分利益的帝国主义和不与苏联合作的中国政府及军阀，而并不重视中国共产党更远大的革命利益；所以，实行土地革命和争取领导权，既为保守的、在军事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国民党所不能容许，也

①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43页载，此专门委员会成立于1923年4月；而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所收的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12月29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成立了有布哈林、马林、维经斯基等人参加的“中国问题委员会”。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54～255页。

③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5～266页。

与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实际执行的倚重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极力维持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上层精英统一战线政策相矛盾，这样中共也就没有可能制定出积极的土地革命政策。在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虽然已经认识到“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中国国民党的基础便应该建设在农民上面”，但所规定的“运动之策略”是“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采取行动，认为“不宜开始即鼓吹佃农的经济争斗致召中农之反抗”。^①即便是毛泽东，根据湖南、浙江、广东等地的经验，也认为：在没有强大的组织的情况下，“不能下决心采取激进的步骤反对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因为“一般地说在中国社会分化还没有达到能够进行这种斗争的程度”。^②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要求中共推动国民党“通过开展激进的土地改革，武装农民，在靠近前线地带建立自卫队等途径，把农民阶级吸引到解放运动中来”^③，但仍得不到在中国革命第一线工作的苏联、共产国际代表的有力贯彻。

以被苏联、共产国际认为是“开辟了中国解放斗争的新时期”、展示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力量与决心并“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的五卅运动为转折点，莫斯科的领导人开始支持更加激进的工农群众运动和建立工人、农民的革命武装力量。1925年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立即派正在苏联的共产国际驻中共的代表维经斯基去中国推进革命运动。7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信中共中央：“中国事态正接近转折关头”，“要在最广大的中国工农群众中尽量扩大和加深革命思想和民族解放思想的影响”。“党应该对农民工作给予专门的注意。在中国，农民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一旦把他们正确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定使中国革命所向无敌”。^④在维经斯基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于9月底10月初在北京召开了执委会扩大会议，维经斯基认为他本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中共领导人“确实现在就低估了农民对于中国现阶段革命运动的作用”。^⑤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决议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问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147页。

② 《共产党党团会议》（1924年1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69～470页。

③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1924年2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1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740～744页。

⑤ 《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年9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91页。

题政纲其最终目标是要执行没收土地交给农民的“耕地农有”政策，否则农民便“不能参加革命”，“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现在过渡时期提出的减租、减税等要求可以使农民“革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党不仅要组织和指导农民，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中巩固党的组织。^①这是中国共产党决意积极领导农民革命的政策思想的萌芽。

也是从五卅运动以后，毛泽东对以前“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有所反思，开始注重组织农民运动和研究农民问题。^②然而，只要苏联、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国民党——无论是右派还是所谓的左派——与大量土地占有者即地主阶级的社会联系决定了他们反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立场，所以农民运动的土地革命性质与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是矛盾的，故而在中共的政策思想与表述中就是含混不清、欲言又止的，对农民运动难作强有力和普遍性的领导。1925年10月的中央扩大会议曾经决定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但到1926年7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仍然是重复这一要求，直到11月上旬中共中央才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人选，而该委员会制定并于11月15日经中央局批准的《目前农运计划》所强调的是“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治原则。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宣传的也是“农民运动”思想，比如“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等，^③包括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授课和其他一些著述，也基本上是从人口构成和农民受压迫剥削的阶级地位分析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并给予实例论证，并无关于“土地革命”的系统论述。这反映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思想总体状况。

促使共产国际确定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政策的契机是国共政治矛盾的表面化和激烈化，与土地革命政策相关的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革命发展战略和社会改造方针等也开始得到初步的讨论和理论建构。苏联、共产国际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国共合作，但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力量对联俄、联共政策或明或暗地实行反动。蒋介石认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398～399页；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第76页。

②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第4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41页。

③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页。

为苏联无诚意援助中国革命而是支持共产党扩张势力，于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武装发动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活动的“三二〇事件”（也称“中山舰”事件），沉痛打击了苏联、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为了加强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的直接领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以维经斯基为主席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于6月19日开始在上海工作，维经斯基并参加中共中央执委会的工作。8月，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使团在广州调查、研究局势，对“三二〇事件”作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批评鲍罗廷过分注意与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各派系的上层联合，而不相信有可能以日益发展起来的城乡群众组织为基础来建立强有力的左派，并依靠这些组织对蒋介石和“中派”施加压力，促使其向左转；认为应该通过加速开展城乡群众运动的办法来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和中国共产党。^①远东局使团9月12日《关于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结果和结论》指出：蒋介石3月20日的行动和后来对左派和共产党的进攻，“是广东内部主要围绕农民问题产生的社会冲突的急剧尖锐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而考虑到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须承认“革命的直接任务是为了全体农民的利益和朝着民主革命的方向来解决土地问题”，“长期不解决这一任务就会意味着反动势力的加强，而解决这一任务就可以由广东农民组成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各种阴谋的坚强堡垒”。^②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前夕，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于11月初举行联席会议，起草了准备提交全会审查和中共“五大”讨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第一次提出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并认为：民主革命阶段尚不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的时机，但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则必须取消土地私有制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③11月下旬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把中国革命问题列为中心议题，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言以及全会的决议宣布了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走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时期”，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保证是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前途是建设一个反帝的、工业和土地国有化、对外贸易实行垄断、与苏联结盟的国家。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共“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这是因为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293～294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82、49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第289～291页。

产阶级，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则中国的实际统治权又将落入在外国帝国主义之手”。决议案认为：“倘使无产阶级不能提出农村政纲就不能把农民拉进革命斗争，而失去它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其规定的农村革命政纲包括减租，没收军阀、买办、地主、劣绅的土地，以及“国家帮助合作社及其他互助机关”，并指明：“实行上列办法，亦即是使农村革命进到更发展的阶段的过渡办法。”^① 斯大林更明确指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东西”，这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即“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② 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中共在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下召开“五大”、派遣罗易赴中国取代维经斯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共的代表等事项作出决定。

负有把中国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发展成为土地革命使命的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于1927年2月到达广州，事实上这时国共合作已进入严重危机的时期。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迫使纠察队缴械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人群众。但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集中力量反抗蒋介石的镇压，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和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一起继续革命。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邀请了被认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等人参加。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等人的指导下，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第一次作出包括实行没收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建立农村合作社组织等农民政纲的《土地问题决议案》^③。在中共“五大”召开前夕，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作出关于农民运动的三项决议案，中共中央在“五大”后向各省委以通告形式转发；其中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指出：如果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和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④至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通过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动员在中国作为基本群众的农民参加革命武装以筑成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进而夺取政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333、335、336页。

②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第144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第55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166页。

权，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在土地革命即民主革命胜利后，以农业合作化防止农民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并且，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精神在中共“五大”上的多次发言为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影响深远的基础。他为了论述与左派国民党联盟共同争取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特别结合俄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否定运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经济以为社会主义斗争作必要准备的“民粹主义”主张，指出：当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而是由更加革命的阶级领导完成时，其结果就会超出建立资本主义，而“开创了一个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中国革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在这个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并不立即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将在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废除。”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保证是政府的革命性质即“民主专政”的政权，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区别，是“一种介乎民主主义（也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政权形式”。“说它是一个民主政体，是指它的基础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由三个阶级组成的联盟；说它是一种专政，是指这三个阶级在一个纲领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整体，去推翻和打倒它们联盟以外的一切阶级。”现在“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建立民主专政，领导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把国民革命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建立民主专政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不必要的。但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引起的阶级冲突，将不会像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那样采取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形式。”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与民粹主义的主张是不同的。民粹派的纲领宣称俄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否认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其性质是反动的。而非资本主义理论是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并不否认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这种经济发展应该差不多相当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在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达到一定的阶段，那时资本主义制度下固有的一切生产方法都将被采用。”“这意思是说在中国为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要具备的那种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实现，但是不需要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基础。”^①很显然，非

^①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1927年5月4日）、《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1927年5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397、412、405~406、415、409~410页。